



南大商学评论

Nanjing Business Review

论 文

富民和收入分配的效率

洪银兴

交易成本与合约选择

Yoram Barzel

寡头垄断竞争、技术创新与多产品企业

鞠建东

中国服务需求弹性的估计：基于Baumol模型的分析

程大中

适宜技术、人力资本积累与长期增长

邹薇 代谦

通货膨胀钉住：一种新的货币政策框架

杨建明

金融挤兑的一种博弈论模型描述与贝叶斯纳什均衡的惟一性

蒲勇健

国有商业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关于不良贷款的监管博弈分析

曾诗鸿

哈耶克式自发制度生成论的博弈论诠释

韦森

如何分析生物技术的经济影响

范存会 黄季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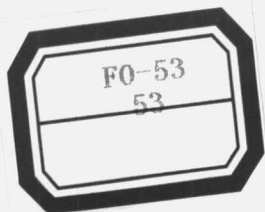
特别报道

共整合与拱论

林建甫

人 民 出 版 社

2



南大商学评论

Nanjing Business Review

人民出版社

2

责任编辑:李 赟

装帧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大商学评论(第二辑)/刘志彪等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

ISBN 7-01-004343-4

I. 南… II. ①刘…②郑…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7349 号

南大商学评论(第二辑)

NANDA SHANGXUE PINGLUN(DI ER JI)

刘志彪 郑江淮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2.5

字数:236 千字

ISBN 7-01-004343-4 定价:24.5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论 文

富民和收入分配的效率	3
	洪银兴
交易成本与合约选择	14
	Yoram Barzel
寡头垄断竞争、技术创新与多产品企业	35
	鞠建东
中国服务需求弹性的估计：基于 Baumol 模型的分析	50
	程大中
适宜技术、人力资本积累与长期增长	72
	邹薇 代谦
通货膨胀钉住：一种新的货币政策框架	95
	杨建明
金融挤兑的一种博弈论模型描述与贝叶斯纳什均衡的惟一性	109
	蒲勇健
国有商业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关于不良贷款的监管博弈分析	125
	曾诗鸿
哈耶克式自发制度生成论的博弈论诠释	141
	韦森
如何分析生物技术的经济影响	167
	范存会 黄季焜

特别报道

共整合与拱论	181
	林建甫

CONTENTS

Articles

- Enriching the people and Efficienc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3
Hong Yinxing
- Transaction Costs and Contract Choice 14
Yoram Barzel
- Oligopolistic Competi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Multiproduct Firms 35
Ju Jiandong
- The Evaluation of Service Demand Elasticity in China
Based on Baumol Model 50
Cheng Dazhong
- Appropriate Technology,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Long Run Growth 72
Zou Wei and Dai Qian
- Inflation targeting : a new framework for monetary policy 95
Yang Jianming
- A game theory model on the financial crisis with an unique
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 109
Pu Yongjian
- Behavior Analysis of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department about Nonperforming Loans 125
Zeng Shihong
- Hayekian Spontaneous Order Trad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 141
Wei Sen
- Analysis Method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on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Biotechnology 167
Fan Cunhui and Huang Jikun
-

Special Report

- Co-integration an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rteroscedasticity 181
Lin Jianfu

论文

Articles

富民和收入分配的效率

洪银兴*

摘 要：富民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二是共同富裕。现在需要解决好两者的统筹。缩小收入差距的重点在低收入群体。其根本途径是减少低收入群体的数量，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分配体制创新的重要内容是使劳动、创造、创业、知识和人才都能在分配上得到尊重。这种制度安排就是各种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实现要素报酬的前提是要素股权化，知识、技术和管理的股权化，需要与要素市场化相结合。知识、技术和管理是先进生产要素，也是稀缺的要素。这些要素在股权化中还原为较大的份额，是市场规律使然。

关键词：富民 收入 分配

* 洪银兴，南京大学商学院，电子邮件：yinxing@nju.edu.cn。



十六大报告要求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这种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集中到一点，就是富民。富民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二是共同富裕。现在需要解决好两者的统筹。其目标就是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一、富民和缩小收入差距

经济发展的基本内容是增加人民福利，也就是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水平。公平和效率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要面临的选择，原因是在现有的收入水平下，公平和效率两个目标不可能兼得，只能兼顾。这就有个谁为先的选择。

过去我国的收入分配基本上属于保障性分配，追求的是平均主义。实行这种分配政策的结果是普遍的贫穷。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为了加快增长，选择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体制。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其具体体现。

应该承认，二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贯彻效率优先的分配原则取得了明显的积极效应，支持了国民经济长时期的持续增长。与此相应，人民群众的收入在整体上也有显著的提高。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明显扩大。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衡量收入分配平等程度是基尼系数，它介于0和1之间。基尼系数接近于0，收入分配便接近于绝对平均；基尼系数接近于1，收入分配便接近于绝对不平均。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初期很低，大致在0.18~0.20的水平。据世界银行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15。高于美国0.401和英国0.326的水平。

对我国收入差距的显著扩大，除了必须取缔的依靠非法收入所获取的高收入外，合乎规律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种解释是二元结构变动的影响。在二元经济结构中，经济增长在现代化的工业部门首先发生，在这个部门，就业量小而生产率和工资高；在传统农业部门中，就业量多而生产率和工资低。在传统农业得到改造之前，两个部门的收入差距将随着经济的增长进一步扩大。

第二种解释是发展效应。目前影响收入差距的发展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外资的进入，二是结构调整。外资企业进入，会形成一批高收入阶层。结构调整会使弱势行业出现下岗和失业，会使分配不均情况更趋严重。

第三种解释是非劳动收入的作用。在现阶段，依靠单纯的劳动收入在一般情况下是难以先富的，因此先富起来的主要是靠资本、知识和企业家等要素投入所获得的收入。这些要素对我国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发展都会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可以用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的差距来说明。

第四种解释是经济起飞对储蓄的影响。经济起飞需要巨额资金积累，能为之提供巨额储蓄的只有高收入阶层，由此便出现收入越高的阶层收入增长越快的马太效应。在经济起飞时期，收入分配政策向最能提供储蓄的高收入阶层倾斜也是正当的。

以上解释都可以从效率的角度得到肯定，而且也是富民的重要环节。就我国来说，地区之间客观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不同的企业有经济活力的差别，不同的人有致富能力和机会的差别。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就是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现阶段的中国，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起飞，不能过分地、单纯地依赖收入分配的差距。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收入差距的容忍度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相关，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低条件下，即使其基尼系数大大低于高收入国家，由于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可能比高收入国家更严重（见表1）。农民收入的相对下降，城市职工的失业和下岗。一些群体过去存在的相对地位也会改变。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不仅发生在不同地区间，也发生在不同阶层间。经济的增长会受到处于相对贫困地位的集团和阶层的抵触。特别要注意到，在人均GDP处于低水准时，如果收入差距过大，最低收入者的收入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冲突。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我国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美国水平，但美国的人均GDP达2万多美元，而我国才80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不能得到满足。这就是现阶段会产生车匪路霸、坑蒙拐骗和社会治安问题的经济原因。

表1 社会问题与收入差距的相关关系

人均GDP	高	低	低
收入差距	大	大	小
社会问题	小	大	小

面对收入差距扩大及已经和正在产生的负面效应，国家现实地提出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任务。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差距过大也不是社会主义。根据库兹涅茨的倒U形曲线，基尼系数高低同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是按倒U形的形式发展的。也就是说，随着人均GNP的增长，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起初也是增长的。这种不平等程度在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据某些学者的统计分析，一般是在1500美元以后）达到最高点，然后基尼系数便开始下降。收入差距便开始缩小。人们把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的那个“拐点”看做是进入现代化阶段。现在突出小康，意味着收入差距扩大的状况不能等达到那个“拐点”时再去解决，现在就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在继续实行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



起来的政策的同时，更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以及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特别要使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和改善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

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富民要求，不能影响提高效率的富民要求。对初次分配起调节作用的市场调节注重效率，不可能承担缩小收入差距的职能，缩小收入差距的职能义不容辞地由政府来承担，其作用的领域是再分配领域。人们一般认为政府调节的主要措施是对低收入者提供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这固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根本的还在于发展，主要路径是调整劳动力的就业结构。现在的低收入者大部分在处于结构弱势的行业就业。因此解决低收入者问题的关键是寻求劳动力从低效率低收入行业中转移出来并进入新的行业的通道。在农村，主要途径是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劳动力转移出农业部门的通道。在城市，一方面要通过发展新的行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要对劳动力进行各种职业培训，使之适应新的就业岗位的需求；再一方面是给失业者提供各种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条件和机会。

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是减少低收入群体的数量，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这是富民的具体措施化，因为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的前提，不是减少高收入者的比重，而是要减少低收入者的比重。这同时体现了效率要求。每个社会发展都要寻求发展的动力，进入中等收入者群体的原先的低收入者是发展的受益者，同时也是发展的推动者。中等收入者阶层越是扩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动力也就越强。中等收入群体不只是收入概念，还是阶层概念。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是由公务员、律师、医生、企业主、教师、工程师等组成。我们可以发现这一部分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一个社会最稳定的阶层。一个社会，中产阶级阶层越多，这个社会就越稳定，发展动力也就越强。反过来，如果一个社会低收入阶层占的比例很大，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很不稳定的社会，而且也难以前进。目前我国中等收入者的标准是一个人的年收入在五万到八万元，所占的比例有的说是占10%，有的说是占12%，总的来说，中等收入者在我国所占的比例不是很大。今后中国的收入结构不应该是金字塔型的，应该是橄榄型的，也就是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低收入阶层小，高收入阶层小，而中等收入阶层要大。这种社会阶层结构，对一个社会无论是发展还是稳定都是最优的。

二、富民和要素报酬

从提高效率方面富民，不能仅仅靠按劳分配，还需要通过多种非按劳分配的途径获得收入。这就是确立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从而使资本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进入居民收入结构。

在要素属于私人所有的条件下，私人经济不只是私人投资，属于私人所有

的各种要素都属于私人经济。与此相应，企业的所有制（无论是在私人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就不只是以资本投入为实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结构，还是以多种要素投入为实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结构。要素报酬就体现了这种结构。

选择何种分配方式，与分配的功能相关。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分配看做是被动的生产成果的分配，没有看到它对生产效率能起到其他机制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效率来说，福利经济学的定律是只有市场竞争机制才能实现效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列茨等人则从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发现市场不完全，单纯靠市场调节不能完全解决效率问题。由此就提出分配对效率的激励功能：“如果信息不完全，效率问题和分配问题不能被如此轻易地分开。例如，不论经济是否具有帕累托效率，经济本身就取决于收入分配。”^①

过去在讲到收入分配与效率的关系时，往往指的是劳动效率，因此就有按劳分配。现在提出效率问题不只是劳动效率，更为重要的是资源（要素）配置效率，所谓的帕累托效率指的就是这种效率。按劳分配只能激励其中一种要素即劳动的效率，但不能激励其他要素的效率。这就提出其他分配方式问题。按要素投入和贡献进行分配的方式（简称要素报酬）就应运而生。其功能是：不仅要刺激劳动要素所有者的劳动投入，还要刺激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所有者的各种要素的投入。

在说明要素报酬的必要性时需要了解按劳分配方式的局限性。首先，按劳分配的基础是劳动者都使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而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必然要提出所有者的权益在分配上的实现问题。其次，马克思所讲的按劳分配指的是个人消费品分配原则，这同收入分配在外延上是有差别的。现实中，职工取得的收入并不仅仅是用于购买个人消费品，其中会有相当一部分用于购买股票和企业债券、银行储蓄、购买房地产等投资活动，以取得投资收入。对这种客观存在的非按劳分配收入在理论上做出说明，并肯定其合理性自然会提出多种分配方式问题。第三，生产过程是多种生产要素的结合，劳动只是其中的一种要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主要约束因素是资本、技术、企业家要素供给不足。过去的理论只讲按劳分配，原因是在公有制条件下只有劳动要素是私人所有的。而在现实中，不只是劳动，资本、技术、企业家等要素都可能为私人所有。单靠按劳分配不可能起到动员劳动以外的要素的作用。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了一种教条：封建社会按土地分配，资本主义社会按资本分配，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动分配。现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要打破这种教条，要在同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实现各种分配方式并存。这就是按各种投入要素进行分配。

^① 斯蒂格列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现代经济理论特别强调激励。在知识、技术、企业家等要素的所有权（全部或部分）属于私人的情况下，激励理论所要解决的是，不仅要刺激劳动要素所有者的劳动投入，还要刺激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所有者的各种要素的投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为推动发展，不仅需要尊重劳动，还要尊重创造和创业，尊重知识和人才。体制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体制上鼓励各个要素的所有者自觉地将要素投入生产力发展过程，并且使劳动、创造、创业、知识和人才都能在分配上得到尊重。这种制度安排就是各种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所谓要素报酬就是指按劳动投入、按资本投入、按技术投入、按企业家要素投入取得报酬，也就是按资分配、按劳分配、按技术投入分配、按企业家要素投入分配。

要素报酬机制的理论阻力是马克思针对资本—利息、劳动—工资、土地—地租这种“三位一体”公式所做的批判。仔细分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可以在两个方面说明要素分配与三位一体的区别。首先，在马克思看来，“三位一体”公式的庸俗性在于将资本、劳动、土地都同等地看做是价值的源泉。但马克思并没有否认，土地所有权、资本和雇佣劳动成为收入的源泉。^②其次，收入分配与价值创造不是同一层面问题。虽然可分配收入只能是新创造价值，但分配理论不一定由价值创造理论来说明。价值创造与劳动相关，分配则与要素所有权相关。资本、劳动、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属于不同的所有者，分配过程也就是各个要素所有权的实现，就像马克思说的，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实现。《资本论》关于剩余价值分割的分析说明了分配中实现要素所有权对提高生产力和增加社会财富所起的积极作用。

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需要充分动员先进生产要素，因此按要素贡献取得报酬的机制特别需要解决以下三方面问题：

一是激励资本投入。在现阶段，发展经济需要足够的资本投入，资本投入主体不仅有国家，还有企业，还有私人。在多元投资主体组成的公司中就含有所有者权益分配项目来实现各个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十六大已经解决了有没有个人财产、有多少财产不能成为政治上先进落后的评价标准，从推动经济增长的目标考虑，财产的来源及对财产的支配和使用的方向则成为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评价标准。按此标准，按资分配应该是合理合法，值得鼓励的。这里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私人直接办企业雇佣劳动，作为私营企业主获得资本收入，承认按资分配就要承认其资本收入的合法性；另一类是居民将一部分不用于消费的收入，购买股票取得股息，购买债券取得债息，也可通过持有企业（包括私人企业）股权的途径获取资本收益。这类私人投资实际上就同居民将储蓄存入银行一样。区别只在于后者是间接投资，前者是直接投资。两者又有风险（收益）程度的差别。承认所有这些不同途径的资本所有权收入，并且提供不同风

^② 参见《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934页。

险和收益程度的私人投资渠道，也就提供了足够的激励私人资本投入的机制。

二是激励知识和技术投入。将技术投入列入生产价值的劳动，就出现其报酬问题。技术投入的报酬，即技术投入的所有权在分配上得到体现，技术开发所付出的成本得到相应的收益。目标是调动科技人员技术开发的积极性，推进技术进步。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技术和管理人员的教育和培训费用固然有社会提供的部分，但其相当部分还是由私人提供的，再加上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成本。因此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私人所有。与此相应，技术人员提出更高收入的要求是合理的。现实中的技术投入，不仅包括科技人员的劳动，还包括科技投入的凝聚或结晶，如产业化的科技成果、专利等。科技成果的价值得到科学的评价，知识产权得到保护，知识产权的收入得到体现，可以说是现阶段要素报酬的重要方面。

三是激励经营者成为企业家。企业家是一种生产要素，是对管理素质和能力的概括。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对管理有两个方面的界定：第一，它是参与创造价值的劳动；第二，它是资本的职能。这就是马克思说的：“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劳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③ 因此，管理投入（即企业家要素投入）作为一种劳动应该取得劳动收入，但它作为资本职能则应该参与资本收入（利润）的分配，而不是仅仅得到劳动收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把资本分解为作为所有权生息资本和执行职能的资本两个方面。与此相应，资本所产生的利润就分解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④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执行职能的资本可能有两种状况：一种是职能资本家同时执行监督和管理的劳动，一种是将监督和管理职能交给别人。在前一种状况下，企业主收入中包含了其监督和管理的报酬，而在后一种状况下，监督和管理的报酬就和作为企业主收入的利润分离。在现阶段，无论是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还是私营企业主都有一个成为企业家的目标和要求。根据熊彼特的界定，企业家与创新相联系，只有不断地进行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组织制度创新的经营者才能成为企业家。经营者要能成为企业家除了要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关键是在分配机制上承担创新的风险和收益。长期以来，为什么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的创新精神不如私营企业主，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原因就是经营者没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既不能获得创新成功的收益，也不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特别是有一部分国有企业经营者存在“59岁现象”，临到退休开始贪污。如果在分配制度上实行经营者股权，企业家通过年薪、股份等分配形式参与利润分享，体现经营者的管理才能及其投入，就可以促进更多的经营者成为企业家，克服经营者腐败，并鼓励其

③ 参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69页。

④ 参见《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26页。



管理创新。

要素报酬可以是在各个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也可以是同一个人按其投入的要素获得多种要素贡献的报酬。同一个人既有劳动报酬，又有其他要素的报酬，其富裕程度是明显的。因此上述激励不只是激励某个要素所有者，同时也要激励个人投入多种要素，例如劳动者创业投资就可以获取资本收入和经营性收入。

三、分配效率和要素报酬的实现

理论上确定了要素报酬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还需要解决实践中要素报酬的实现。当然这也需要在理论上做出界定。要素报酬依据的不只是各种要素的投入，更为重要的是在产出中各种要素的贡献。贡献指的是什么？总的贡献指的是企业的总收益，各自贡献的报酬则体现在总收益中的份额。各种要素的贡献如何衡量，各种要素在收入分配中得到多大的份额？我们可以综合从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来做出规定。

在西方经济学中，各种要素的报酬份额由要素市场的供求来决定。工资、利息和地租等作为相应要素报酬的形式，其水平反映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即要素的稀缺性。各种要素贡献则用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来衡量。这些原理对现实的要素报酬实现机制的指导意义在于，根据要素的市场稀缺性来确定各种要素在分配份额中的权重。斯蒂格列茨在批判福利经济学第二定律（依靠市场机制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效率）时提出了分成制思想：“激励问题与分配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分成制是说明这种关系的一个例证。”^⑤ 要素报酬可以按照分成制的思路来寻求实现机制。

现实的分成制就体现在股份制形式下的按股权分红。以货币形式的资本、知识、技术、管理、企业家等要素都可以作为私人资本投入。一般说来，在股份制条件下，各自根据投入数量及重要性程度取得股权份额后按股分红，能够较好实现按要素贡献取得报酬。

按照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分配是所有权的实现。分配是对新创造价值 $V+M$ 的分配。其中 V 为劳动报酬， M 为所有权报酬。现在需要解决的是：要素报酬是在 V 中实现，还是在 M 中实现？如果只是在 V 中实现，这些要素所有者所得到的只是劳动报酬，而没有分享剩余，没有成为所有者的一分子。根据现代制度理论，这些要素所有者也会偷懒，因此确有成效的激励应该是这些要素参与 M 的分配。反过来，如果要素所有者只是参与 M 的分配，而不参与 V 的分配，这意味着要素所有者没有参与劳动。实际情况是要素所有者常常是既要依其参与劳动参与 V 的分配，也要依其要素所有权参与 M 的分配。

^⑤ 斯蒂格列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5 页。

对劳动者来说,其投入劳动取得相应的报酬(V),但不排斥劳动者在取得按劳分配的同时取得要素报酬。具体地说,允许劳动者投入资本(购买股票或认购本企业股权),因而允许其获得按资分配的收入。技术、企业家等要素即使是劳动者所拥有的,也不能只是在V中实现。如果劳动者对企业有技术投入,也就可按技术股分红。这样,劳动者的一部分收入可以作为劳动报酬在V中体现,一部分收入可以作为股权分红在M中体现。劳动者参与股权分红是其作为所有者一分子的体现,这就将劳动者的行为与企业的所有者利益捆在了一起。劳动者以其资本、技术等要素投入参与剩余产品分配,就可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由此对经济增长具有与自身利益相联系关心。

就经营者的企业家报酬来说,管理投入作为企业家职能就应该参与资本收入(利润)的分配,而不是仅仅得到劳动收入。他凭其企业家要素的投入,也就获得企业家股权收入。

私人所有的要素投入企业后应该在股权结构中得到体现,从而在股权结构中包含技术股、经营者股权。为了便于股权分割,这些要素股权需要还原为资本股权。这种含有要素股权的结构可以为技术进步和企业家进入治理结构提供产权制度的保障。

现在我国许多企业,无论是公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基本上还是资本金的股权结构。在现代经济中,私人产权不仅仅是投入资本金之类的物质资产,还应包括投入知识、技术和企业家要素之类的无形资产。现在大家都在谈产权和产权制度的改革,应该说这就是进步,没有明晰的产权就不可能有效率。问题是大家所重视的产权基本上还只是物质产权,而不是知识产权。这基本上反映了旧经济时代的特征,或者说反映投资拉动型经济时代的特征。单一要素的资本股权结构必须改变,形成包含各种要素特别是含有知识、技术在内的股权结构。

以上关于要素股权化的假设符合现代企业的发展趋势。在现代经济中,投入企业的资本、技术、企业家等要素实际上都会作为企业股权结构的组成部分参与分配。因此,企业就是各种要素的集合,企业中的收入分配是根据企业中投入要素的比例及相应的作用安排的。这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马说的:“在企业中,每种要素都是由某个人拥有的。企业只是一个合同集,而这些合同不过是规定投入品的联合方式以创造产出以及从产出中获得的收入在投入品间的分配方式。”^⑤从这种合同关系中,各种要素的收入均是要素所有权收入。

知识、技术和管理在股权化时应该还原为多大的资本份额?这就提出要素股权化与要素市场化结合的问题。在广义的价格理论中,人们把利息率、工资和地租分别看做是使用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这些价格分别

^⑤ 尤金·法马:《代理问题和企业理论》,载《企业的经济性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7页。



在各自的要素市场上形成。这对于有效地配置和使用生产要素起的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要素市场化的功能是解决要素的价格由要素市场上供求状况决定的问题。知识、技术成果和企业家分别进入各自的要素市场出售，由此实现各自的价值。例如，技术要素，在技术转让时科技成果应该得到科学的评估，以充分实现其价值；在企业的股权结构中，在充分估价技术投入价值的基础上安排技术股，收入分配中充分实现投入的技术的价值。

当然，由要素市场供求形成的各种要素价格只是平均价格，或者说形成的是计算进入企业的各种具体要素报酬的系数，因为属于不同所有者的同一种要素也不是同质的。要素股权化不仅要衡量各种要素的供求关系，还要对各种要素做质的评价。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本由有形的物质资本转向无形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新经济理论先导的新增长理论将资本区分为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而不是物质资本。企业家要素也可归结为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实践已经证明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的增殖速度更快，增殖能力更强。资本增殖与其说是资本的自行增殖，不如说是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作用的结果。这个结论将直接影响要素分配的份额。在要素股权化过程中特别要注意提高知识、技术等无形资产在产权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资本推动型增长阶段，资本（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起支配作用，因此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支配作用，作为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人格化的“知本家”将替代资本家成为财富创造的中心。与此相应，收入分配明显向“知本家”倾斜。

可以预计到，根据各种要素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知识、技术和管理是先进生产要素，也是稀缺的要素。这些要素在股权化中可能还原为较大的份额。这是市场规律使然。这些要素的所有者成为财富创造的中心，分配（收入和财产）向这部分要素所有者倾斜是非常自然的。

参考文献

- (1) 斯蒂格列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 (2) 洪银兴：《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